

DOI: 10.13718/j.cnki.xdzk.2017.04.017

重庆市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 及影响因素研究^①

蔡 进, 廖和平, 李 靖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以重庆市转户进城定居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 分析了自 2000 年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和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① 融入水平的分方面: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 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总体较低, 得分为 68.76, 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其中社会生活融入得分最高为 72.90, 价值观念得分最低为 65.81, 表明转户进城后农户的社会生活融入最快, 价值观念融入最慢, 融入最难. ② 影响融入水平因素方面: 个体与家庭特征因素中, 解释力大小分别为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其中, 转户进城时间对城市融入水平的控制力最强, 性别和婚恋状态的控制力最弱. 融入水平评价因素中, 解释力大小分别为社会生活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价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融入、制度环境融入, 其中, 社会生活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 制度环境控制力最弱.

关键词: 重庆市; 转户进城; 融入水平;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68(2017)04-0108-07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力要素也快速向城市流动. 而农户定居城市面临的障碍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1-2], 如何破除户籍障碍、打开农户进城的大门是目前政府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2014 年 7 月 30 日,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提出“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到 2020 年实现 1 亿农民转户定居城镇的目标”, 意味着农民进城定居不再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 重庆市自 2010 年户籍制度改革以来, 已有 700 万农民转户定居城镇成为新市民, 农户定居城镇后其城市的融入状态、生计状态、心理状态如何, 需作进一步研究.

农民市民化程度包括静态度量和动态度量 2 个方面^[3-4], 静态度量是用数量来衡量, 即农民转户进城定居的数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而动态度量主要从市民化内涵衡量, 即农户要从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等方面完全融入城市才算真正的市民化^[5-6]. 农户身份上虽然转变为市民, 但是心理上要转变为市民比较难. 有学者^[7]利用 OLS 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状态, 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较低, 并且第二代农民工融入程度

① 收稿日期: 2016-04-20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KJ130721).

作者简介: 蔡 进(1988-), 男, 四川广安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国土管理的研究.

通信作者: 廖和平,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就影响农户城市融入程度因素而言,制度因素直接决定农户的市民身份^[8],职业环境、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影响农户心理上的市民身份认同^[9-10],另外住房条件是影响农户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11].重庆市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区,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转户进入重庆市主城区,对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需作进一步研究,确保农户进城后生计水平有所上升.鉴于此,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进行评价,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影响融入水平的因素,以期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评价框架

1.1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5年1月至6月,在重庆市主城九区选取自2010年转户进城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500份,通过对问卷进行统计和筛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72份.问卷内容的设置主要有2部分:一是个体与家庭基本属性,二是城市融入水平评价相关问题.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包括被调查者的转户进城时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老家宅基地情况等属性信息;城市融入水平评价相关问题包括农户进城后的职业环境融入、社会生活融入、价值观念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和政策制度融入5个方面,其中职业环境、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各设置了4个问题,政策制度设置了3个问题,共计19个指标(表1).根据农户自身融入情况分别对这19个指标进行打分(满分100分),进而得到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各项指标和整体水平的得分情况.

表1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	职业环境	职业类型	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 私人企业 无工作
		工作环境	办公环境如何
		同事关系	是否与同事关系良好
		职业前景	是否对该份工作前景感到乐观
	社会生活	居住环境	是否购买了商品房 对小区环境是否满意
		邻里关系	与邻居关系是否处于良好
		人际交往	是否在城里新交了朋友
		休闲娱乐	空闲时间是否利用城市休闲设施
	价值观念	城市消费观念	是否适应城市的消费观念
		城市维权意识	遇到消费缺斤少两是否维权
		市民行为规范	是否遵守交通规则,是否将垃圾丢进垃圾桶
		健康意识	是否经常锻炼身体,生病是否去医院
	制度环境	转户政策认知	是否详细了解转户政策
		住房医疗教育制度认知	是否详细了解城市住房医疗教育制度
		政治权利制度认知	是否了解城市居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利
	文化心理	心理落差	进城后是否有心理落差,有多大
		歧视感知	是否感觉周围有人歧视自己
		社区归属感	是否将居住小区视为以前村庄
		市民身份认同	是否认为自己已经是城市人

1.2 评价框架

本文从职业环境融入、社会生活融入、价值观念融入、制度环境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 5 个方面,选取 19 个评价指标建立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体系. 其中社会生活融入是农户进城后直接面临的问题,包括居住环境、邻里关系、人际交往情况和休闲娱乐情况;价值观念融入是进城后农户从思想上向市民靠近,包括城市的消费观念、城市维权意识、市民行为规范、健康意识 4 个方面;文化心理融入是农户真正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包括农户进城后的心理落差、周围人群对自己的歧视感知、社区归属感和市民的身份认同感 4 个方面.

2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分析

由表 2,表 3 可知,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得分为 68.76,表明重庆市自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融入半市民化水平. 其中 80 分以上的农户占调查样本的 16.87%,50~80 分的农户占样本的 62.29%,小于 50 分的农户占样本比例的 20.84%.

表 2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结果 1

一级指标	总体得分	>80 分/%	50~80 分/%	<50 分/%
总体城市融入	68.76	16.87	62.29	20.84
职业环境融入	69.38	13.52	68.25	18.23
社会生活融入	72.90	21.14	58.95	19.91
价值观念融入	65.81	15.62	62.86	21.53
制度环境融入	66.18	15.15	63.47	21.38
文化心理融入	68.89	18.51	58.24	23.25

表 3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结果 2

二级指标	总体得分	>80 分/%	50~80 分/%	<50 分/%
职业类型	68.63	8.36	70.23	21.41
工作环境	69.87	11.36	78.15	10.49
同事关系	70.55	15.68	69.33	14.99
职业前景	68.45	18.69	55.29	26.02
居住环境	75.21	29.36	60.84	9.8
邻里关系	70.22	15.67	61.41	22.92
人际交往	69.39	19.21	53.67	27.12
休闲娱乐	76.77	20.31	59.89	19.8
城市消费观念	66.12	12.08	61.89	26.03
城市维权意识	61.45	9.95	56.99	33.06
市民行为规范	69.92	19.56	63.21	17.23
健康意识	65.74	20.89	69.33	9.78
转户政策认知	71.39	21.56	71.22	7.22
住房医疗教育制度认知	66.35	16.33	59.56	24.11
政治权利制度认知	60.79	7.56	59.64	32.8
心理落差	69.78	16.67	55.32	28.01
歧视感知	70.39	11.86	61.32	26.82
社区归属感	68.49	28.31	61.01	10.68
市民身份认同	66.88	17.21	55.31	27.48

职业环境融入的总体得分为 69.38, 80 分以上农户只占样本比例的 13.52%, 小于 50 分农户占样本比例的 18.25%。其中职业类型和职业前景指标得分较低, 主要是因为农户进城后部分农户无职业或者临时职业, 农户担心进城后的工作问题, 另外农户对工作环境要求并不高, 大多数农户能够与同事搞好关系; 社会生活融入总体得分为 72.90, 80 分以上的农户比例 21.14%, 50~80 分的农户比例 68.25%, 小于 50 分的农户比例为 19.91%。社会生活是农户转户进城后面临的最直接改变, 进城农户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有所提高。其中居住环境得分 75.21, 表明农户对进城后的居住条件来说相对满意, 休闲娱乐得分 76.77, 农户进城后享受到农村无法比拟的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便利性; 价值观念得分 65.81, 80 分以上的农户比例 15.62%, 50~80 分的农户比例 62.86%, 小于 50 分的农户比例 21.53%, 其中城市消费观念和市民行为规范得分比较高, 表明农户进城后能够适应城市的消费习惯, 也能够快速适应红绿灯、垃圾处理等市民行为规范; 制度环境融入得分 66.18, 80 分以上的农户比例 15.15%, 50~80 分的农户比例 63.47%, 小于 50 分的农户比例为 21.38%, 其中转户进城政策认知得分较高, 表明进城前农户对转户政策认知相对较熟悉, 对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和政治权利认知得分较低, 表明农户进城后对城市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制度认知较少, 特别是对政治权利漠不关心; 文化心理融入得分 68.89, 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 80 分以上的农户比例 18.51%, 50~80 分的农户比例 58.24%, 小于 50 分的农户比例为 23.25%, 农户进城后的心理存在一定的落差, 虽然户籍上已经是城市居民, 但是市民的身份认同感还不是很高。

3 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分析

3.1 研究方法

地理探测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学者王劲峰在分析疾病风险机理时提出的一种方法, 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 4 个部分内容。本文主要运用因子探测器来测度解释力的大小, 即测度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和不同城市融入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户城市融入水平的解释力大小, 具体计算公式为:

$$P_{D,H} = 1 - \frac{1}{n\sigma^2} \sum_{h=1}^L n_h \sigma_h^2$$

式中: $P_{D,H}$ 为影响因子 D 对融入水平 H 的解释力; n, σ^2 分别为样本量和方差; n_h, σ_h^2 为 h ($h=1, 2, \dots, L$) 层样本量和方差。 $P_{D,H}$ 取值范围为 $[0, 1]$, 数值越大表明分类因素对城市融入水平的解释力越强。

3.2 结果分析

3.2.1 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作用

个体与家庭特征因素的融入水平得分普遍较低, 绝大部分处于 60~70 分之间(表 4)。因子探测分析得到不同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的因子解释力大小(图 1), 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 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其中, 转户进城时间对城市融入度的控制力最强, 因子解释力为 0.0189, 其主要原因是, 转户进城时间越长的农户, 对城市的适应时间就越长, 比起刚转户进城的农户来说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 自己的市民身份认同感也就越强; 家庭收入水平的因子解释力为 0.156, 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农户, 有更多的资金去消费城市丰富的商品和快捷的服务, 也更有机会去接触城市的其他居民和文化, 体会城市与农村之间消费商品的差距, 比起收入水平低的农户更能够适应城市生活; 家庭住房情况解释力为 0.146, 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家”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房”, 在城市中有无住房是城市人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像农村中的农户有没有土地一样, 关系到农户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年龄的因子解释力为 0.104, 中国农民对家乡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怀乡情节,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怀乡情节越强烈, 调查发现, 60 岁以上转户进城的农户, 85% 的农户每年要回老家 2 次以上; 家庭人口数量因子解释力为 0.0084, 主要变现为家庭人口数量越多, 在城市中生活成本就越大, 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就越重, 越不利于农户的城市融入; 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和婚恋状态的因子解释力分别为 0.0072, 0.0054, 0.0051, 对农户城市融入度控制力比较低。

表 4 不同社会属性特征的城市融入度比较

属性	变 量	融入水平	属性	变 量	融入水平
转户进城时间/年	1	63.33	家庭人口数量	1	66.95
	2	66.12		2	66.37
	3	68.85		3	65.25
	>4	72.29		4	65.61
5 人及以上	64.35	性别		男	65.69
性 别	女	64.88	家庭年收入水平/万	<1	61.33
	年龄/岁	<20		1~2	62.38
年 龄	20~39	68.37		2~3	62.87
	40~59	65.22		3~4	63.35
	>60	63.64		4~5	64.17
	>5	64.79	家庭住房情况	已购买了商品房	69.5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5.71		正打算购买商品房	67.36
	初中	65.93		不打算购买商品房	66.58
	高中	66.34	老家退地情况	已退承包地、宅基地未退	64.45
	大专及以上学历	67.12		已退宅基地、承包地未退	64.89
婚姻状态	未婚	66.38		承包地、宅基地都未退	63.99
	已婚,无小孩	65.11		承包地、宅基地都已退	65.87
	已婚,有小孩	65.37			
	离异	6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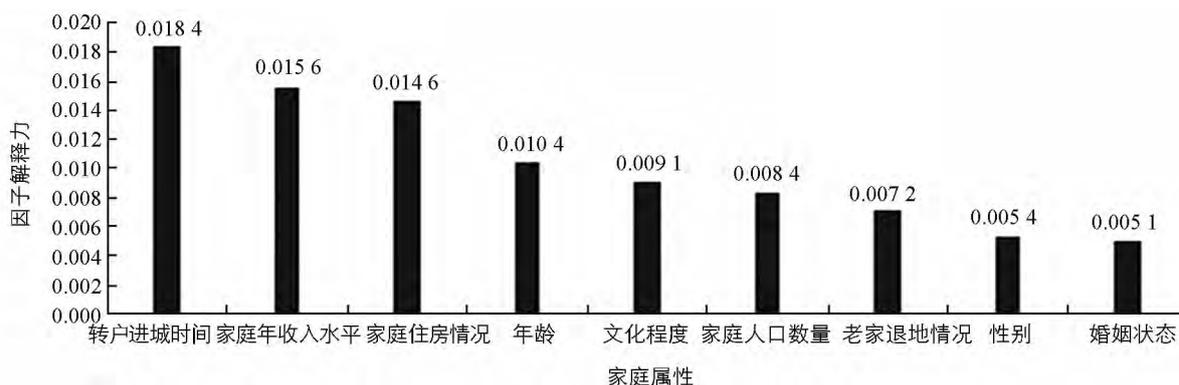


图 1 个体与家庭属性的因子解释力

3.2.2 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作用

因子探测分析得到不同融入水平评价因子解释力大小(图 2)。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生活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价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融入、制度环境融入,解释力从大到小分别为 0.1807, 0.1761, 0.1523, 0.1002, 0.0647。由图 2 可知,社会生活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居住环境的差异是农户进城后面临的最直观的改变,小区居住环境、房屋结构与大小、邻里关系等直接影响农户城市融入感受,一般来说人际交往能力越强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越强;文化心理融入因素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比较强,解释力为 0.1761,心理落差是农户进城后是否达到心理期望而产生的差距,心理落差越大农户的社区归属感和市民身份认同较弱,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农户的市民认同感不高,有 18.15%的新市民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有 55.56%的新市民认为自己介于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有 26.29%的新市民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价值观念解释力为 0.1523,它是农户进城后一段时间内为适应城市而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包括城市消费观念、维权意识、行为规范和健康意识等,城市消费观念形成、维权意识越强、市民行为规范越好、健康意识越强的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职业环境因子解释力为 0.1002,相对于其他因子解释力较小,但是仍能较强地影响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对于有工作的新市民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同事关系、职业前景越好,相对的其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制度环境因素的解释力最小为 0.0647,表明“新市民”对转

户进城政策、社保医保政策越了解其城市融入度就越高,主要原因是转户政策关系农户的经济利益,如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处置、转户进城补偿等,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并不受其对政治权利认知的影响,也反映出农户进城后经济诉求放在第一位,政治诉求并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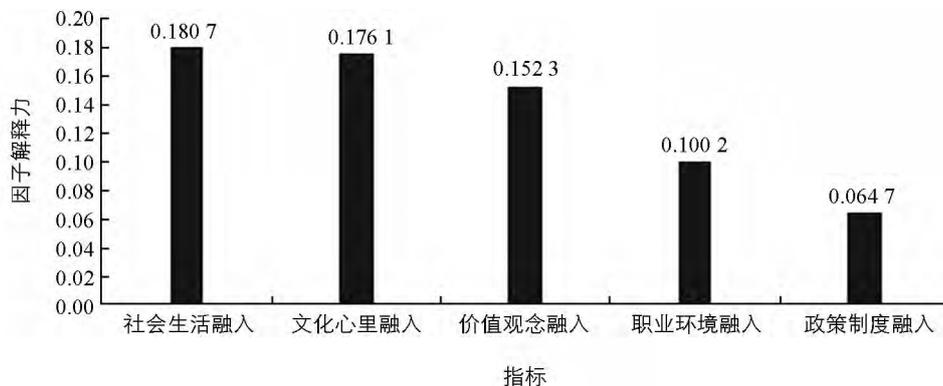


图2 融入水平评价指标的因子解释力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重庆市转户进城定居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自2010年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和影响因素。

1) 农户城市融入水平总体得分68.76,表明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较低,总体上转户农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得分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生活融入(72.90)、职业环境融入(69.38)、文化心理融入(68.89)、制度环境融入(66.18)、价值观念融入(65.81),表现出转户进城后农户的社会生活融入最快,价值观念融入最慢,融入最难。

2) 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作用中,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0.0189,0.0156,0.0146,0.0104,0.0091,0.0084,0.0072,0.0054,0.0051。其中,转户进城时间对城市融入水平的控制力最强,性别和婚恋状态的控制力最弱;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作用中,社会生活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价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融入、制度环境融入,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0.1807,0.1761,0.1523,0.1002,0.0647。其中,社会生活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制度环境控制力最弱。

4.2 研究展望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户脱掉了“农民”的外衣,能够进城落户成为新市民,但融入城市需要从经济、社会、心理3个方面完全融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城市融入水平的高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年龄、转户进城时间、职业环境等。转户进城后农户的生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生计的可持续性是新市民必须面临的问题,政府应该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心理等方面建立保障机制,确保进城农户能够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就业方面,应该通过鼓励农户进入城市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鼓励农户加强社会人际交流,建立自己的开放性社会网络。从研究方向来看,小城镇与大城市融入水平比较,转户进城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应该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 [1] 都阳,蔡昉,屈小博. 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J]. 经济研究,2014,60(8):4-13.
- [2] 卢海阳,梁海兵,钱文荣.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2015,36(7):26-36.
- [3] 徐建玲.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8,29(9):65-70.

- [4] 孙文凯, 白重恩, 谢沛初.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11, 57(1): 28-41.
- [5] 朱 宇.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 [J]. 南方人口, 2004, 19(3): 21-28.
- [6] 刘同山, 孔祥智.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8): 73-80.
- [7] 何 军.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 26(6): 15-25.
- [8] 李永友, 徐 楠. 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J]. 管理世界, 2011, 27(1): 62-70.
- [9] 钟水映, 李 魁. 农民工“半市民化”与“后市民化”衔接机制研究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4(3): 64-70.
- [10] 黄志亮, 刘昌用.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庆模式探索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1(2): 90-94.
- [11] 许秀川, 汪 军, 张尧瑶, 等. 基于次序 Logit 与 Probit 的川渝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36(11): 143-150.

Wang JF, Li XH, Christakos G, Liao YL, Zhang T, Gu X & Zheng XY. 2010. 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4(1): 107-127.

Wang JF, Zhang TL, Fu BJ. 2016. A measure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Ecological Indicators* 67(2016): 250-256.

王劲峰, 徐成东. 2017.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地理学报* 72(1): 116-134.

Study on Urban Integration Level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rmer Rural Household Farmers in Chongqing City

CAI Jin, LIAO He-ping, LI Ji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ongqing City about the households who lived originally in the rural areas and have then settled in the urban areas sinc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of the city in 2000 and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s,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of those households transferred into the urban commun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ir overall level of urban integration is low, scoring 68.76 and they stay in a semi-citizenship state. Of the variables studied, social life integration has the highest score (72.90) and the value integration the lowest (65.81),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armers integrate relatively rapidly into the urban social life but slowly and difficultly into the urban valu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famil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level of urban integration, the dat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ransfer of the farmers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followed in sequence by family income, family housing, age,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size, retention/giving up of their original rural homestead, gender, and marriage status. Of the evaluation factors studied, social life integration has the greatest explanatory power, followed in order by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value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tegration.

Key words: Chongqing Cit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ransfer in urban area; integration level; influencing factor

责任编辑 胡 杨